

我的三位导师

○何玉如（1962建筑）

1956年，我17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直到1967年离开清华，在建筑系整整度过了十一个春秋。期间，教过我的老师许许多多，有老前辈，有前辈，也有仅大我三四岁的师兄、师姐们。他们都是学问精深才华横溢，为人师表，令人尊敬，深受爱戴的老师。但是，相处时间较长，并能近距离地聆听教诲的导师，要数梁思成、汪坦和吴良镛三位先生。

汪坦先生引我入门

1962年我从建筑系本科毕业。六年的学习生涯中虽然学到了不少基础知识，但同时也受到不少干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除四害、大炼钢铁，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清理思想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不少时间，也占据了不少思想空间。虽然毕业时，我是全班唯一的优秀毕业生奖章获得者，但总觉得学得太少，在建筑的领域中还没有迈进门槛。因此，系领导动员我报考本系研究生时，我就欣然同意了。那个年代，研究生数量极少，全班80多名同学只收了两名研究生。

一名是周逢同学（后任北京建工局副局长），研究方向侧重于规划，由吴良镛先生任导师。另一名研究方向是公共建筑，导师汪坦先生。这样，我就跟随汪坦先生学习、研究将近五年。

汪坦先生是系里的名教授，副系主

任，曾师从世界级建筑大师赖特先生。我是汪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因此他也曾想用赖特先生的教授方法来引领我。除了一般的基础课以外，还要面对面地教授建筑的基本知识，以及一些外围的学问。正像他自己在赖特先生家共同生活过三个月那样，他要求我每两三周去他家里一次，将近期阅读的英文资料的内容，用英语与他对话，此外还要我两年内默画二百至三百项世界名建筑，及时交他批改。对我来说，这些无疑是非常吃力的。

汪先生对我的严格，基于他自身治学态度的严谨。众所周知，他是西方建筑理论和设计的权威。而同时，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也同样有极深的造诣。记得他曾给我阅读他年青时写的辽代大木结构的论文，让我惊讶不已，论文中将檐下的斗、拱、昂等构件一一“拆卸”下来加以分析。这种踏实的学风，对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繁琐的古建筑设计及其他难题时，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我的研究方向是图书馆建筑，正值国家图书馆上马，我就参与了设计。期间汪先生不仅教给我图书馆设计中三条流线（读者、工作人员和书籍）的基本原则，而且还督促我到图书馆去工作一段时间，深入了解图书的流通过程，并且从书架的最基本构件设计起。虽然后来对论文选题的宽窄建筑系里的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但

是，我领会汪先生教我从最基本的细胞做起的这种治学精神是非常正确的。我以为研究生阶段最主要的是学会如何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汪先生的文化修养极高，对建筑以外的相关艺术颇有研究，他曾经给我讲述过金石的书法、章法、刀法，写信时贴邮票的构图等等。尤为突出的是汪先生对音乐的爱好。他家中藏有数千张音乐唱片，被建筑系里传为佳话。我有时在他家中一边欣赏优美的乐曲，一边接受他和师母马思裾先生（小提琴大师马思聪先生的妹妹）的音乐启蒙教育。

我离开清华后，又在京外工作多年，所以极少再见到汪先生，直至1995年，因为女儿要赴美国学习，去告别清华。不期，在新图书馆前遇到汪先生，那时先生已年近八旬，但仍精神矍铄，谈锋甚健。汪先生80大寿时，我因有事不能脱身，未去贺寿。听说他还惦记着我，说我太忙，为我的缺席开脱。不久，听说汪先生身体不适，我和夫人一同去校医院看望他，同时补祝大寿。汪先生85岁时为我班毕业40周年纪念册题词，他写道：“祖国的面貌一天比一天光彩夺目——余生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么质朴的老人，回想“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不公待遇，真让人寒心。

题词后不久，汪先生突然离世，以至于来不及在他生前见他最后一面，他的题词竟成了对我们的珍贵遗言。

梁思成先生带我出国

梁思成先生的一生，他的学问、他的成就等等已经有大量的纪念文章，这里我只想记下一段带我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往

事。

1963年国际建协在古巴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并举办第一次世界建筑系师生会见大会，梁先生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为了扩大古巴革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南美国家将派大批学生赴会，我国也准备派遣少量学生代表，以示响应。当时学生代表有清华、南工和同济三校各一名，我有幸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这样，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和梁先生“朝夕相处”。

当时，梁先生已是花甲之年，又是建筑界的泰斗，我是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不满25岁）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学生。在巨匠面前，我不免有些惶惶然。梁先生为了排遣我的不安，出国前每天让我搭乘他的车一起去建设部参加学习。

他叮咛我每天8点以前到他家，并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每天不见不散”。老人的幽默一下子使我拘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记得还有一次，在古巴游览风景区过夜，由于接待的房间不多，我和梁先生被分配在一个标准间里，而且仅有一张大床，我非常尴尬，梁先生又不让我睡在地板上，还风趣地说“我们同床异梦吧！”

出国前梁先生的夫人林洙女士一再嘱托我在生活上多多照顾梁先生。其实与其说是我照顾梁先生，还不如说是梁先生时常关照我。梁先生知道我第一次出国，所以在礼仪、举止方面详尽地传授、示范。在飞机上让我坐在他的旁边，甚至教我过马路时应先过一半，再过一半，并且眼睛一定要“左顾右盼”。

梁先生对后辈的厚爱，不仅表现在生

□ 名师轶事

活上，在事业上更是如此。梁先生将我介绍给团里的其他前辈，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家：南京的杨廷宝先生，上海的陈植先生、吴景祥先生，广州的林克明先生、陈伯齐先生，武汉的殷海云先生以及北京的戴念慈先生、杨芸先生和何广乾先生等等。这些老先生对我们后辈也都是爱护有加。

梁先生还为我讲了陈植先生的许多故事，以后我和陈植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同肖老虎，他大我三轮，自称“老老虎”，昵称我为“小老虎”。至今我还珍藏着陈老先生送我的、他亲自绘制的有虎头图案的新年贺卡。

梁先生告诫我向这些老先生学习。作为建筑师要处处留心观察，杨廷宝先生就是这种有心人的典范，他身上总是带着钢卷尺，遇到合适的家具和建筑细部，总要拿尺子去量一量，记住它的尺寸。记得在去古巴的途中，由于飞机出现小故障，临时在英国停留过夜，住在机场的小旅馆，其房间极小，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床后留出一小条挂衣服的空间，床头有一张小桌，门口一个洗面盆，空间极为紧凑。梁先生欣赏不已，让我将平面图绘制下来。

梁先生学术渊博，但平易近人，处处表现出睿智和幽默。记得我在二年级做课程设计，去访问幼儿园时，梁先生带领我们去接近小朋友。梁先生的下巴上有一颗痣，他让小朋友们轮流在他的痣上摁一下，每摁一次，梁先生就发出一次叫声，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这样我们一下子与幼儿园的小朋友和阿姨拉近了距离。这次出国，梁先生身为团长常为我们讲笑话，把团里的气氛搞得非常活跃。一次女同胞们照相，邀请梁先生加入，梁先生马

上自嘲地说“我是玫瑰花中一根刺”。梁先生离开了我们已经40年了，他风趣、幽默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

吴良镛先生领我设计

早在学生时期，就听说吴良镛先生是梁思成先生的高足，在学术上有极深的造诣。今天更是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中国建筑界的泰斗人物。所以，我以前只能是远远地望着吴先生，不曾想退休以后，反倒有较多的机会，在吴先生身边聆听教诲。

2002年我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一度心里矛盾重重。一方面想，当了十年的总建筑师，重于技术管理，自己亲自主持设计的工程并不多，总想以后再作点设计；另一方面又想自己曾经得过大病，也许在设计上该划句号了。就在这时候，吴先生找我“合作”设计南通博物苑新馆。吴先生曾对我说，他当了多年的建筑系主任，行政事务繁多，一直到退下来以后才真正搞点学问，也指出了我当了总建筑师自己亲自动手设计的作品相对较少。吴先生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谦虚之词，但对我的评述是中肯的。这样，我很快就投入了南通博物苑新馆的设计，以后又有南通城建馆的设计。接着，南京红楼梦博物馆也中途要我加入。

四年多来。我一直在配合吴先生搞设计，感受颇多。

首先是吴先生的创作热情，时时感动着我。南通博物苑新馆的任务接受以后，2002年7月冒着酷暑我们一起去现场踏勘。第一次到南通那天已是晚上10点，吴先生一放下行李就同我到现场，借着手电筒的光，察看了周围环境。第二天清晨7

点，吴先生就打电话叫醒我，讨论他对总体位置的设想。接着两天收集大量有关南通博物苑的资料以及创始人张謇的详细情况。每有情况总是亲自笔记，从不请人代替，还要实地参观。每次从野外回来吴先生总是汗流浹背，衣衫湿透。以后，施工过程中，我一再劝他工地的事由我负责，有问题时我会及时汇报。但事实上，去现场十有八九吴先生也是同去的。在工地上爬上爬下，对于八旬高龄的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吴先生却说“这比当年山东孔子研究院的现场少去多了”，“如果我不能到现场，也就不再做设计了”。这种精神，怎能不让那些疏于去现场的后辈们惭愧。建筑创作出现了偏离基本原则的社会倾向，作为建筑界的泰斗，吴先生有时也会感到无奈。他认为，最可行的是用自己正确的方法来为社会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也许这正是吴先生年过八旬还热情创作的主要目的。吴先生接受任务是非常慎重的。南通早期（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早在1988年吴先生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规划”条目时就提到过，对张謇的规划思想、实践、办实事、办教育、创建博物苑等等都是熟知的，因此接受博物苑新馆设计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以后，南京的红楼梦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南京市领导请吴先生出山，经过半年多的考虑，直到吴先生已经有所构思后，才接受下来。

吴先生构思方案总是从大处着眼，从城市规划的大环境，再到这个小环境，最后才是个体。南通博物苑新馆处在博物苑的大公园中，此处有张謇当年的住处“濠南别业”，南有南通市的一座古老的道观，东有张謇当年（100年前）建立的博物

馆，有北馆、中馆、南馆等。因此新馆就要考虑与城市中“道观”的关系，以及与原有博物馆建筑组成一个有机的建筑群组。现在新馆建成后印证了吴先生所指导的原则是多么正确，2005年全国博物馆界在南通举办建苑100周年的庆典，得到了来自各地100多位博物馆馆长和专家的一致赞赏。

吴先生的创作态度极为认真、严肃，南京红楼梦博物馆2003年接受任务，2004年初作出两种模式的方案，得到了红学界和建筑界的充分肯定。之后，吴先生又经过三轮的修改，直到2006年初才上报方案。以后，在7月交付初步设计前，又修改了一轮。用南京市领导和建设方的话来说，一轮比一轮精彩。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吴先生知识渊博，哲学、文学、历史等等方面功底深厚，每有构思总能引经据典。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吴先生谦虚待人，明明是引领我参加设计，总说是“合作”。然而，在我的心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吴良镛先生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



作者与吴良镛先生（左）